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3-0266-05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途径的探索

陈 家 付

[摘 要] 根据毛泽东的论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彻底转换,它包括实现理论主题的转换,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实现理论形态的转换,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实现理论生长点的转换,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实现理论实践力量的转换,使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民所掌握。这四个方,科学地指明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

[关键词]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途径

[中图分类号] B27 [文献标识码] A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标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和发挥指导作用的重大命题。马克思主义产生于 19 世纪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展示了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普遍真理。但是,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提出和阐述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如何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这就必然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必须针对中国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不仅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背景与中国国情的巨大不同,科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中国化的问题,而且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途径,即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理论形态、理论生长点和理论实践力量的转换,使之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一、实现理论主题的转换:“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

从根本上说,理论主题是由实践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 19 世纪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理论主题就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分析,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历史趋势,论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并找到实现这种代替的道路和力量。这一理论主题,严格地建立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和国家,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情况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也就必然地要发生转换。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1](第 287 页)同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也不可能提出和阐述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第 115 页)。

由此,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途径的第一个规定,即“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2](第 802 页)。这就是说,要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转换,研究中国的实

际,了解中国的现实国情,依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来指导中国革命。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毛泽东已实际开始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转换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随后,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又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第111-112页)其后,经过遵义会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理论主题逐步被牢固地确立了起来。同时,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的哲学著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在中国的转换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首先就是要研究和认识中国的国情,把握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这是就它的普遍指导意义而言的,不能因此而教条式地用它来硬套和剪裁中国革命。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实际,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和政治民主化程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存在巨大差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先后实现了工业化,进入到工业经济阶段,成为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而中国仍然处于前工业化阶段,不具备资本主义发展所造就的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物质基础,由此造成了普遍的政治民主化程度不高。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这种差异,并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3](第542页)也正是从中国革命具有的特殊性出发,毛泽东具体论证了中国革命所要经历的基本过程和发展阶段,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马克思主义在被灵活地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的过程中,实现了其理论主题的重大转换。

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还必须研究中国的过去,懂得中国的历史。这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在中国转换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强调,现实和历史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割不断的,要认识中国革命实际,不但要了解现实,还要了解历史。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3](第534页)。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就是从分析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古代至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百年来的革命运动史入手,来分析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特点的。他对中国历史所作的全面、系统、科学的分析,对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国情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又尖锐地批评了那种不重视研究历史的态度,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不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他要求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和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研究中国的历史,就是要继承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为现实斗争服务。

二、实现理论形态的转换:“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

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用西方的思维习惯、西方的话语方式来构筑的理论,具有鲜明的西方特点,是在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中展开的。要使这一理论适应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革命斗争,就必须根据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使其带上应有的民族特点。毛泽东强调:“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4](第747页)这既包括理论的内容,也包括理论的表现形态。毛泽东深深地懂得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中国人民的接受心理,坚信不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转换,就无法使这一理论真正地普及于中国,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

由此,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途径的第二个规定,即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形

态的转换,赋予这一理论以中国的民族特点,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此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第 658—659 页)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带着中国的特性”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

使马克思主义带着中国的特性,就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去提升中国文化,用中国文化去诠释马克思主义。1943 年 5 月,毛泽东在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6](第 41 页)毛泽东本人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能够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中国特有的辩证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完美地结合起来。他一方面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继承,把中国文化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另一方面,又善于运用中国文化解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国深厚的文化沃土之中。

毛泽东也强调用中国的话语方式来表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到通俗易懂,为中国人民所喜爱。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不仅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也有着本民族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毛泽东不仅重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料,也强调要善于运用我们本民族的语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反对“言必称希腊”的洋教条,大力倡导“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第 534 页)。从毛泽东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生动活泼、富于民族特色、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精彩语言表达,确实成就了一种通俗易懂、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

三、实现理论生长点的转换:“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长点扎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它随着时代变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实践的深化而不断实现认识的深化和理论的创新。19 世纪 40 年代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后,马克思、恩格斯就把这一理论付诸欧洲的革命运动,在丰富多彩的革命实际中修正、补充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根据当时俄国革命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探索和揭示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客观规律,实现了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进到列宁主义阶段。由于中国处于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中,中国革命有着不同于西方和俄国的特点和规律,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7](第 374 页)。这就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途径的第三个规定,即实现理论生长点的转换,不断把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上升为理论。毛泽东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1](第 296 页)为此,他提出了理论创新的迫切要求:“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着了。”^[7](第 408 页)这就是说,要扎根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过程中,把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创新。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本质方面。

使中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就是要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中国革命生动的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活水源头。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策略,不是来自于书本,也不是来自于少数人的创造,而是来自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1](第115页)因此,毛泽东认为,正确的结论不是到书本中去找,而要在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中得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2](第802页)显然,毛泽东所强调的“使中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是一个理论创造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2](第820页)

使中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还要不断地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教训上升为指导理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中,党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创建了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但也先后出现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次“左”的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无视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使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挫折。中国革命胜利和挫折的经验教训,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际材料。毛泽东曾经回顾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革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4](第825页)没有对中国革命丰富经验教训的总结,就没有理论创新,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四、实现理论实践力量的转换:“被中国人民所掌握”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被人民所掌握,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才能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从依靠力量的基础来说,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它所依靠的力量主体主要是已经工业化和正在工业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无产阶级。这与中国有着巨大的不同,中国是一个无产阶级只占人口少数、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农业大国。这就是说,在中国,革命力量的主体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仅仅依靠无产阶级,中国革命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中国革命必须依靠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大联合,即依靠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没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参加,中国革命将失去其最深厚的力量基础。

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其实践的力量主体必然地要发生转换,也就是要使它被中国人民所掌握,成为中国人民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成为中国人民精神上由被动变为主动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指导思想,这正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途径的第四个规定。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8](第1515页)在这里,毛泽东所提出的“被中国人民所掌握”,深刻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力量基础。

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找到了它的新的实践力量。同时,这也是中国人民艰苦探索的结果。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为了找到一条走向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而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地寻求真理,进行革命斗争。但是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失

败了,各种救国方案包括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都先后破产了。中国人民在极度的痛苦和失望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的这种选择,体现着中国人民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也体现着中国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体现了主观与客观、历史主动性与客观必然性的高度统一。这种选择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发展和发挥指导作用的基本条件,同时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在它的世界性传播中找到了新的实践力量。

这种新的实践力量,其主体是中国农民。毛泽东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9](第 305 页)正因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革命军队的主体,所以,毛泽东高度重视对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以使他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他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2](第 1094 页)为了使全党更好地团结和凝聚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中国人民,毛泽东强调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修养,为此,他向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3](第 533 页)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把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决条件。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掌握,才能真正使它变为中国革命的精神武器。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和理论阐述,立足于中国特殊的国情,科学阐明了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来实现理论主题的转换,要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以实现理论形态的转换,要把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生长点的转换,要让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以实现理论实践力量的转换。这四个方面的转换,构成了以理论主题、理论形态、理论生长点、理论实践力量为主要内容的四位一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正确途径,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参 考 文 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2]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3]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4]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 [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
- [7]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8]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9]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责任编辑 涂文迁)